

礼与兵： 荀子军事隆礼思想略论

杨少涵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杨少涵，河南桐柏人，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文学学士（1999）、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硕士（2006）、复旦大学哲学博士（2009）、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2011）。现为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厦门工学院国学院兼职教授。先后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校理古籍《中庸集说》（卫湜著，漓江出版社，2011年），出版专著《中庸原论——儒家情感形上学之创发与潜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入选“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7）、华侨大学“百名优秀学者培育计划”（2013）。

■ 责任编辑：姚小云

■ 封面设计：伊 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与兵：荀子军事隆礼思想略论/ 杨少涵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5

ISBN 978-7-227-06668-2

I. ①礼… II. ①杨… III. ①荀况（前313-前238）

—军事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E89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9634号

礼与兵：荀子军事隆礼思想略论

杨少涵 著

责任编辑 姚小云

封面设计 伊凯

责任印制 肖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王杨宝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福州雄胜彩印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5101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5.62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668-2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以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 言：“儒家的孙子” //001

第一章 历史背景与理论渊源 //005

- 第一节 春秋战国战争之变质及古典军礼之损益 //006
 - 一、春秋时代古典军礼之发达及战争之艺术化倾向 //007
 - 二、战国时代古典军礼之失落及战争之恶性发展 //010
- 第二节 荀子礼学对诸子思想之扬弃 //014
 - 一、荀子对诸子的批判 //014
 - 二、荀子对诸子的吸纳 //020

第二章 荀子军事隆礼的特质 //027

- 第一节 “军事隆礼”简释 //027
- 第二节 礼的形上化与礼义之统 //032
- 第三节 礼的政治化与隆礼重法 //034

第三章 荀子军事隆礼的功用 //037

- 第一节 正义战争的价值旨向 //037
 - 一、礼→刑、兵：礼之外向功能的分化 //037
 - 二、性恶论：礼义及战争之起源的人性基点 //040
 - 三、兵之用：正义战争作为礼义外向功能的延展 //045
 - 四、王必圣：礼义之道作为战争的价值标度 //047
- 第二节 国强兵胜的道德纲纪 //053
 - 一、从孔孟荀品评管子看王霸之辨及礼法功能之移易 //053
 - 二、国强兵胜的理想力量：仁义之兵 //060

■礼与兵：荀子军事隆礼思想略论

三、国强兵胜的现实力量：赏刑之兵 //064

第三节 礼义之道对忠勇武德的融摄 //068

一、关于忠的一个悖论：

“顺命为上”与“从道不从君”辨 //069

二、礼义之统与作为美德的勇 //073

第四章 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 //083

第一节 荀子军事隆礼思想在后世法兵两家之历史沉浮 //083

一、荀学的理论缺陷与韩非的崇法诋礼 //084

二、两汉以降兵家礼义思想的继绝 //088

第二节 荀子军事隆礼思想的现实意义 //091

一、“仁义之兵”思想对正义战争理论一个问题的回应 //092

二、“附民”“壹民”等朴素人民战争思想的现代价值 //097

三、当代“以礼治军”思想对依法治军和军队道德（规范）

建设实践的意义 //100

附录一：荀子性恶论的思想进路及其理论问题 //107

一、荀子对人性的分判：性恶论的起点 //107

二、荀子性恶论的理论预设：性恶的实质 //113

三、荀子心论的社会价值：性恶的对治 //122

附录二：荀子性恶论之谜 //143

一、引言 //143

二、性本非恶 //145

三、性恶的论证 //148

四、性恶论的理论预设 //150

参考文献 //155

后 记 //171

前言：“儒家的孙子”

荀子是先秦大儒中一个冷眼看世界的热心人。

传统儒学大体上是一种伦理学，儒家伦理总体上又是一种政治伦理。^①儒家政治伦理的精髓就是常说的入世担当精神，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②，孟子“以身殉道”^③，荀子则“人事相参”^④。

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⑤关于军事的思考和战争的实践，也需要一种激扬的热情和担当的精神贯注其中。所以荀子论兵言战与孔孟一样，虽然不免空谈和迂阔，但也不乏激情和热心。

如果荀子只是一个积极问世的“热心人”，实难开创荀学一脉昌盛后世。荀子位列儒统，名追孔孟，更主要的在于其“冷眼”观世：对

①罗光：《儒家哲学的体系》，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140页；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8~59页；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页。儒学原本包括道德心性方面的内圣之学和政治事功方面的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内圣为仁，外王为礼，后来孟子深化内圣之说开创仁学，荀子拓展外王之学开创礼学。但孔子、孟子、荀子都还是强调由内圣开出而且必须开出外王，两者不可或缺才是完整的儒学（杨泽波教授曾对学界流行的“儒学在本质上是心性之学”或“儒学在本质上是道德之学”的偏执论调进行过批判。见其《孟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9~181页）。两者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我认为可以用“政治伦理”或“伦理政治”。这个词表明，中国传统士人之道德修养是“为政治的”，而君王之政治统治是“以道德的”。宋明以降，尤其是明清专制政府对士人严厉的政治压迫，使得士人之事功建构逐渐由朝廷政府转向民间社会。这一渐变可参见余英时：《现代新儒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45页。

②程树德：《论语集释·宪问下》，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29页

③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1页。

④王先谦：《荀子集解·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3页）：“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荀子集解·天论》（第308页）：“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⑤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2、43页；夏征难：《解读〈战争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73~78页。

春秋战国纷纭世事进行透彻观照和深切体悟，进而凝致人性本恶、隆礼重法等惊世大论。这与儒家性善之说大相径庭，尤其是对子思、孟子二人的语伐笔挞，使荀子备受后儒贬斥。^①荀子对子思、孟子传统的反动，根源于其对天人关系的哲学判断。子思、孟子一路多主张天人合一，它有自然和合之积极方面，但也易导致认识上的宿命无助等懈怠倾向，消解人在认识上的主体性。荀子高唱天人相分，一方面剥夺了天的人格性而还其自然性，但另一方面树立了作为智性的人的中心地位，从而从认识论上和天人相待中强化了人的责任心，推进了先秦人文主义进程。^②

天人之分最大的伦理学意义在于回归了人的认识主体性和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治乱、国家兴衰的原因，不再是天之奖惩，而是人类自身的责任。这就意味着，社会的任何现状都是人自身造成的，人要对自身造成的社会后果负责，而且人在对社会现状的改造中居于主体地位。战国末期的荀子看到的只有战争四起，烽火绵延，民不聊生，疮痍遍野。荀子认为，这种社会的混乱和战争的频仍是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和不节制的欲望引起的，人要为这些社会恶果负责。^③

^①《中国思想史》，第205页。关于荀学之历史沉浮，参见：郭志坤：《荀学论稿》（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二十二章，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十二章，马积高：《荀学源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下篇Homer H.Dubs, Hsuntze 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 (Arthur Probsthain, London, 1927), p.82、John Knoblock,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1988), p.36~49。

^②中国古代之人的精神解放，肇始于孔子以前，其历程大致分为两步：一为解放于鬼神，至孔子几以完成；一为解放于人格天，至荀子大业始竣。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三章，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第二章。

^③梁漱溟也认为：“人类的最大祸患，即人类而来。天灾人祸二者相较，人祸远凶过天灾。”但他认为人祸出自自私自本性说是一种误解，他宁可认为人祸是出自与理性相违的“愚蔽偏执之情”和“强暴冲动之气”，因为自私也是出自这种情气。见其《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9~100页。

荀子从这种自私本性和不节制的欲望与有限的社会物资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得出了人性本恶论，而人性本恶又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并导致人际争斗。人际争斗的社会化和政治化就是战争。所以人性恶就是战争恶之理论上的源头。面对这两种恶，荀子感到：在内在逻辑上，需要进行生活“隆礼”以限制人性之恶；在外在逻辑上，需要进行军事“隆礼”以抑止战乱之恶。生活隆礼是由一整套道德来规范，是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处世原则，它制止私人争斗；军事隆礼通过作为礼之功能的延展形式的正义战争来“禁暴除害”，制止国家间的非正义战争。在荀子看来，非正义战争是人性恶欲膨胀的结果，军事隆礼是生活隆礼的扩展；正义战争是礼义抑恶向善功能的延伸，是礼义他律作用在军事领域的类比运用。

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责任心还引出了荀子的两套并行之军事伦理思想：

一是战争中人居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兵之要术”在于“善附民”“壹民”。

二是人要为性恶引起的非正义战争负责，就要以礼化性，以战止战。

这两套军事伦理进而引申出荀子军事隆礼思想的一条原则：正义战争是礼义外向功能的延展。礼义之道是对人自身之“恶性”的节制和教化，正义战争是对非正义战争之“恶性”的规限和控制。这意味着，为避免以战止战的恶性循环，使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得到恒远和美与永久和平，止战之战必须是隆礼尚义的仁义之兵、王者之师，必须由“圣王”发动，必须由“天下之将”统率。

当然，荀子的军事隆礼思想只是一种“大战略”（grand strategy）^①。但荀子没有高居于这个层面，他谈了“将道”，谈了“富兵”，还谈了“教战”等所谓“军事战略”（military strategy）^②。“大战略”所关注的更多是军事生活中的道德价值，“军事战略”所关注的更多是战争行为中的功利效果。对一支军队来说，功利也许是第一位的；但对军人来说，道德应该是很重要的。这两个层面的结合，是在理论上避免“以战止战”的恶性循环的关键，从而使荀子的军事伦理思想趋于完善和理想，不但超迈孔孟等先儒，在一些方面甚至还胜过兵圣孙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被称为“儒家中的孙子”^③。

①“大战略”也称为“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钮先钟认为，相对于传统战略概念，这三个概念有两个特征：1.战争中的非军事手段；2.更长远的和平目的。参见钮先钟：《战略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章。但根据我的理解，非军事手段更主要的应当是指人的因素以及如何使用人、团结人的方法。这正是文人战略家如老子、孔子、墨子等所能思考的层次。

②钮先钟：《孙子三论——从古代兵法到新战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③钮先钟：《孙子三论——从古代兵法到新战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钮氏在比论荀子、孙子的军事思想时，对荀子溢美有加，说荀子“具有科学精神，重视现实，其书中所呈现的战略思想不仅比较系统化，而且与孙子非常接近。……荀子的不信天、不信神，与孙子非常相似”（第130页）、“孙子虽重视战争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战略的平时经济基础则从未有所论列。这也是其不及荀子之处”（第132页）、“荀子对于将道之重视绝不亚于孙子，而其分析的精密则甚至有过于孙子”（第135页）、“其战略思想之精深可与孙子并驾齐驱”（第136页）。

第一章 历史背景与理论渊源

孟子颂诗读书讲究“知人论世”^①，荀子为学言礼亦曰“学近其人”^②。因此理解荀子思想，有必要先弄清楚荀子时代的整体状况及各家学说的基本概况。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谓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这个时期的“人们明白自己面临灾难，并感到要以改革、教育和洞察力来进行挽救”^③。荀子一生^④正是这个时期的尾声。春秋以降，王政不行，世风不古，“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⑤；迄及战国，杀伐日臻，众说纷繁，天下遂归于大乱。

①《孟子·万章章句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本意为交友，后来品诗者借为文学批评法。此处为其更普遍之引申，蔡元培说，“读古人之书，不可不知其人，论其世”（《中国伦理学史·序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②《荀子集解·劝学》（第14页）：“学莫便乎近其人。”荀子所言之“人”，杨倞注云“贤师”，因此这里只是“断章取义”，“其人”特指荀子其人，以承孟子“知人论世”强调人世之重要。当然，若直解“人”为“贤师”也未尝不可，毕竟《史记》本传称荀子也曾“最为人师”，学其礼知其义，当然亦需近其人了。

③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7~15页。

④荀子生卒年代争讼千年，迄无定论，计有以下几说：

1.汪中：《荀卿年表》：活跃于公元前298~公元前238年间（《荀子集解·考证下》）；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生于公元前315~公元前310年间，卒于前230年左右；
3.梁启超：《荀卿及〈荀子〉》：公元前308~公元前213年（《古史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郭志坤：《荀学论稿》：公元前315~公元前217年（《荀子答客问·附录》）；

5.蒋伯潜：《诸子通考》：公元前313~公元前219年；

6.游国恩：《荀卿考》：公元前314~公元前217年（《古史辨》第4册）；

7.钱穆：《荀卿考》：公元前340~公元前245年（《古史辨》第4册）；

8.罗根泽：《荀卿游历考》：公元前316~公元前213年（《古史辨》第4册）。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均本汪中“活跃期”说。

⑤《论语集释·季氏》，第1141页。杨树达：《论语疏证》（第423页）以《礼记·中庸》《孟子·尽心下》《春秋·宣公十一年》《白虎通·诛伐》等文疏证此条，甚详。

《史记》说荀子时“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逐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祲祥”^①。荀子门人也说：

孙卿迫于乱世，遁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②

荀子之时代境况和思想情况大抵可归结为“乱”——“战乱”和“思乱”。这主要源于以礼为纲纪的宗法制度及以之为精神纽带的政治体系受到了冲决。在礼的社会规范层面，平王东迁，周礼不振，引起共主衰微，王命不行，进而又引起列国内乱，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在礼的道德意识层面，周礼纲断，流落民间，对于礼的理解和解说不一，遂有百家竞鸣。荀子的军事隆礼思想就是对这种种“乱”深入反省和广泛综合的结晶。

第一节 春秋战国战争之变质及古典军礼之损益

荀子一生处于战国的后半。战国最大的特点是“战”^③，而战的准备——变法、政变到春秋末期已基本完成，因此战国的政治任务便只是征战、灭国和屠城、杀人。春秋只是各诸侯国的内乱，战国则是诸侯国间的大乱。春秋“内乱”是礼对人（客观上）的失效，战国“外乱”则是人对礼（主观上）的践踏。

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348页。

②《荀子集解·尧问》，第553页。

③张荫麟：《中国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7页；《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60页；史革新：《宏观中国史》（乱世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7页。

一、春秋时代古典军礼之发达及战争之艺术化倾向

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从家族关系推广发挥，以礼乐名分组织社会。^①周初实行侯国分封，各诸侯国君原本就是兄弟或朋友，有着远近不一的姻亲关系。春秋之初去西周末远，礼仪之统下的宗法观念和重名意识等“流风余韵犹浸淫渐渍于人心”^②。因此，从上层国君来说，春秋时代的战争只求屈敌服人，势力均衡，而不以杀戮灭国为目的；^③从下层军士来说，西周军队主体是贵族出身或有贵族血统的“国人”^④，他们参军打仗除了义务外，就是为了获得当时贵族普遍追求的军人荣誉^⑤，而不是拼命杀人以资实货。整个社会的道德意识和军队主体的参军心理、打仗目的，促成了军礼的高度发达，也使得春秋战争成为一种贵族式的兼并战争。

古典军礼的发达。中国古代有所谓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军礼是与征战有关的礼仪，是军事生活和军人行为中的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五章。

②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2年，第369页。有人认为，周代思想文化对战争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礼仪礼节、血缘亲属关系和原始战争规则等三个方面。见贺方润、尉学斌：《春秋战争行为及其时代特征》，《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6月），第42~46页。但也有人认为，春秋时期人君有“根深蒂固的好战思想”，因而孔、墨的义战，向戎等之弭兵都是欺世盗名之言行。见米继军、迟秀兰：《对春秋时期战争原因的思想文化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6期），第260~262页。但据我这里的分析，若指春秋后期还说得过去，若直言整个春秋似不妥。

③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页；张荫麟：《中国史纲》，第117页。

④《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22页；钱穆：《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之名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37页。

⑤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6页。荣誉是一种“非物质资源”。在上古时代，勇士为荣誉而战的心理虽然也会引发更加无畏的战争（参见布鲁斯·林肯：《死亡、战争与献祭》第十一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但这种战争往往以荣誉心的满足而告终，而且人的荣誉感也很容易满足。领土、动产等“物质资源”的掠夺心理却是无止境、难以满足的，因此物质资源掠夺战争也就更加残酷和持久。这也是春秋、战国战争不同的一个战争起源论说明。

一系列专门的道德规范。“三代”曾出现过“礼中有兵”“兵中有礼”的现象，那时“以礼治军”曾是兵学主流。^①虽然春秋时代政风大乱引起礼仪大变^②，但由于周礼观念在人们意识中尚未尽泯，“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它的最高点”^③，使得春秋“直接于礼教最盛之时代”^④，当时各国士大夫隆礼之甚，简直成为一种绝对的信仰：觐国之兴衰以礼、决军之胜败以礼、定人之吉凶以礼、聘问则预求其礼、会朝宿戒其礼。^⑤这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作用于军事，引致古典军礼高度发达。春秋时期的军礼可分为平时治军、战时作战和战后班师、献俘等。^⑥其中又以战争礼即出征作战时的礼仪最为发达，包括师出有名、师不伐丧、乞师之礼、假道之礼、献戎捷之礼、归俘之礼、不斩来使、不伤国君或君子，^⑦几乎包括了现代战争、军事中普遍遵守的所有道德规范。

贵族式或艺术化的战争。春秋一共295年（公元前770～公元前476

①谢祥皓：《中国兵学》（先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②《左传》：“礼者，政之舆也。”（《四书五经》，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992页）《荀子》：“礼者，政之挽也。”（《荀子集解·大略》，第492页）如此则“政治的变化带来了礼制的演变”（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

③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68页。

④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第371页。

⑤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第368～370页

⑥徐杰令：《春秋战争礼考论》，《华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73～77页。

⑦徐杰令：《春秋战争礼考论》；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373页。

年），有史可稽、见诸经传的战争凡531次^①，朝聘会450次^②。但是由于军礼的高度发达，有些战争让人感觉并不是生死决斗，而是一种庄严的贵族游戏，战争极具艺术化。我们从《左传》中可以看到，很多战争只是一些“尚礼的战争”^③，往往表现出一种贵族式、艺术化特征^④，有时甚至近似游戏^⑤，如晋楚城濮之战，楚子玉对晋文公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⑥简直视两军交战为少儿嬉戏。在军事外交上，“往往赋一首诗，写一封信，而解决了政治上之绝大纠纷问题”^⑦；在战争中，“大国来伐，则援据礼法以

①此据陈筱芳：《试论春秋列国间的战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第71～76页。按《左传》《春秋》：楚113，晋111，齐66，秦19，鲁卫郑宋118，戎狄蛮夷36，小国29，吴27，越7，周5。加上戎狄蛮夷之战争36次（戎狄蛮夷之国30多，因此其战争当不在此数目下）。春秋战国战争次数争论不已，除这种说法外，就我所见，尚有以下三说：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52页）：据《鲁史》242年里，列国间军事行动483次。但范书所统计的是“军事行动”，要多于战争次数，因为“战争”是双方已经发生交战的军事行动。（《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第47注②）

2.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第328页）：春秋242年中，列国兵争见于经传者有200多次，其中秦用兵18次、晋楚22次、齐鲁3次、宋楚4次、宋郑52次、齐晋3次、吴齐2次。

3.《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第35页）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上卷）统计为376次。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52页。朝聘会为战争的政治表现，但也具有冲突的紧张气氛。钱穆《国史大纲》（第60页）考证春秋大国朝聘共68次：齐桓15次、鲁郑陈各10次、卫9次、曹许各7次。

③④钱穆：《国史大纲》，第88页。

⑤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0页；钱穆：《国史大纲》，第88页。

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四书五经》，第805页。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对“戏”与“战”的关系疏解甚详：戏为角力，而每有战之喻，“盖战与戏每为一事，特所从言之异路尔。危词耸说，戏亦战也；轻描淡写，战即戏也。当局者‘性命相扑’，战也；旁观者‘云端里看厮杀’，戏也”（第195页）。古代本来就有“戏兵”之说，《宋书·礼志》一“诏内外诸军‘戏兵’于南校之场，故其地因名‘斗场’”，“‘戏兵’正肖今世西语称战斗演习曰‘战争游戏’（Kriegspiel, Wargame）”（第197页）。

⑦钱穆：《国史大纲》，第71页。各诸侯国君卿赋《诗》酬答往来，《左传》中赋诗凡67次。始于僖公（僖1、文9、成2），盛于襄、昭（襄29、昭25），衰歇于定、哀（定1、哀1）（《国史大纲》，第95页）。从赋诗次数隐约可以看出，愈接近战国礼的观念愈是淡薄。

曲直为老壮，往往可以藉片言以退雄师”^①。

二、战国时代古典军礼之失落及战争之恶性发展

古典军礼的最终失落。战国时代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和钢制品的发明，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②和生存条件的改善，进而引起了人口的剧增。^③人口增多对于军事的意义，一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促进了生产力长足进展，为扩军备战提供了殷阜的战备物资；^④二是郡县征兵制的推行带来的大规模兵源需求能够得到满足^⑤，但客观上也使大规模屠杀成为理论上的可能。经济和人口的增进又带来了作战样式的变化，^⑥即车战转向步战。步战最大的特色是灵活机动，这给战国时代主要作战方式——包围战^⑦——创造了条件，包围战所要求的就是兵力能够做迅速转移。然而包围战也使得大规模屠杀成为实际上的可能。由于经济的发展，包围战就有了雄厚的经济做后盾，旷日持久的物力、

①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第371页。钱钟书：《管锥编》亦说“‘礼’者非揖让节文（code of courtesy），乃因事制宜（decorum）之谓；故射仪则君子必争，戎礼则君子亦杀”（第205页），因现代战争多杀，故“德谚有曰：‘战争之本旨较战争之方式为先’（Kriegsrason geht vor Kriegsmanier）。杀敌者战之本旨；三舍之退，一麋之献，以及下车免胄、执犒师，皆方式而已，戎仪也，非戎礼也”（第206页）。

②④ 《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第36页；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5页。

③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5页。

⑤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0、285页。

⑥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4～285页。

⑦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9页注①：战国时代的主要作战方式包括野战和包围战。

人力消耗战从而也成为可能^①。这些巨变促使军事指挥专门化。春秋（中期）以前的军事统帅，多是文武不分职，国君和卿大夫往往集军权和政权于一身。^②但是随着战争日趋复杂化，军事指挥也日益专门化，已非一般文治人员所能担当，所以战国多出兵书和将才^③也绝非偶然。但这些将才和兵书虽然也偶尔讲礼义之举和仁义之兵，但他们的军事原则终究是功利主义，强调仁义和善兵只是为了能多杀敌人、多打胜仗。所以春秋是艺术的战争，战国是战争的艺术。春秋之艺术化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以礼义为内在规则，战争要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战国之战争艺术化后虽然也讲礼义，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组织战争，只不过是发动战争粘贴一个漂亮的标志。

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阶级的崛起使本已淡化疏远的宗亲情谊和君臣名分“失掉过去的氏族血统的纽带，变成了买卖的关系”^④。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征服国和夷狄之民等所谓“野人”遂应征入伍以满足兵力的扩充，而这些人本来就不受周礼约束，或者教化不深，完全

①“春秋初期作战，均为横阵之正面作战，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殊无变化可言。”（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二册，第87页）“这种整齐的车阵，一经交战，战败的车阵一乱，就很难整顿队伍，重新排列车阵继续作战，所以胜负很快就决定了。春秋时的大战，如城濮之战、鄆之战、鞌之战胜负都在一天内就见分晓，鄆陵之战决胜负也只二日。可是到战国时代，情况就不同了。战国时代七国‘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杨宽：《战国史》，第287页）长平之役，前后竟达三年（公元前262~公元前260年）之久。仅从后勤保障上说，春秋各国尚无如此大的经济实力，即使战国时代也勉为其难。长平之战，“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吕氏春秋·应言》）。春秋时代规模较大之作战样式为围城战，春秋时期的经济实力虽然也发展到了使得围城战可以跨越季节限制的境界，但无论如何无法与战国之超级包围战相比。见乔国良：《春秋时代围城战战争季节计量研究》，《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第70~75页。

②杨宽：《战国史》，第291页；《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第51页。其实文武分开观念尚不严格，朱元璋曾说：“文武不分途。”（钱穆：《国史新论》，第337页）只是这种现象在春秋更加明显而已。

③张荫麟：《中国史纲》，第118页。

④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30页。

可以被驯化为只顾杀人的战争机器。所以“以前是贵族任战士，现在是战士为贵族”^①。各国变法最具功效的是军功赐爵制度，这是一项奖励杀人的政治措施，它深深地刺激了基层官兵争功杀人的野蛮心理。军功赐爵制最终造成两种后果，一是战争成为大屠杀，二是士兵成为杀人狂。^②在这种背景下，古典军礼几以荡尽也就不足为异。

战国时代战争之变色。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到了春秋晚期，已然变色，日臻惨烈。这种情况从郑伯肉袒战^③、楚子期焚尸战^④、宋楚交兵“易子而食，析骸而炊”^⑤等战况可见一斑。到了战国，战争风气大换，屈敌变成灭国，服人转为灭口。战国之“战”表现有三：一是战争频仍；二是灭国；三是杀人。战国250多年里，战争多达230次（中国历史上战争总数3801次的6.05%）^⑥；战乱217年（战国全部年份的84%），无战乱记载仅43年（19.8%）。^⑦西周初年有国千余，春秋初

①钱穆：《国史大纲》，第89页。

②军功赐爵在秦国政治生活中更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能为普通平民带来政治、经济和生活中的各种特权。军功赐爵最重要的一项是“计首授爵”，它使得士兵为夺取首级冒记军功，竟至残忍杀害同伴。关于其功过，参见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0~166、180~187页。

③《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传》《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二年》，《四书五经》，第871、1352页。

④《春秋左传·定公五年传》，《四书五经》，第1178页。

⑤《春秋左传·宣公十五年传》《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四书五经》，第881、1354页。

⑥战国战争次数“至今似乎没有一个较为精确的统计”（赵禄祥主编：《资政要鉴》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51页）。此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上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统计，战国起止年代按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计算。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第329~330页）按公元前428~公元前221年计算，战争凡222次，其中魏赵用兵48次，魏韩49次，魏秦7次，魏楚2次，魏伐宋郑中山各2次、伐翟燕齐各1次，韩秦用兵21次，韩伐齐郑各3次、伐宋2次、救鲁1次，赵秦用兵20次、伐燕1次，燕伐齐赵各1次，齐伐魏9次、伐鲁并宋各3次、伐赵莒各1次，楚救郑伐郑各2次、攻鲁3次、伐燕齐秦各1次，秦伐楚9次、伐齐伐燕各3次、伐蜀3次，五国伐秦2次，三国击秦2次，五国击秦1次，四国击楚1次，三国伐楚2次，三国救赵1次。

⑦史革新：《宏观中国史》（乱世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9页。